



本文作者：陆学艺

中国的一大难题

农民问题

：

农民问题一直是我国政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一、当代中国农民的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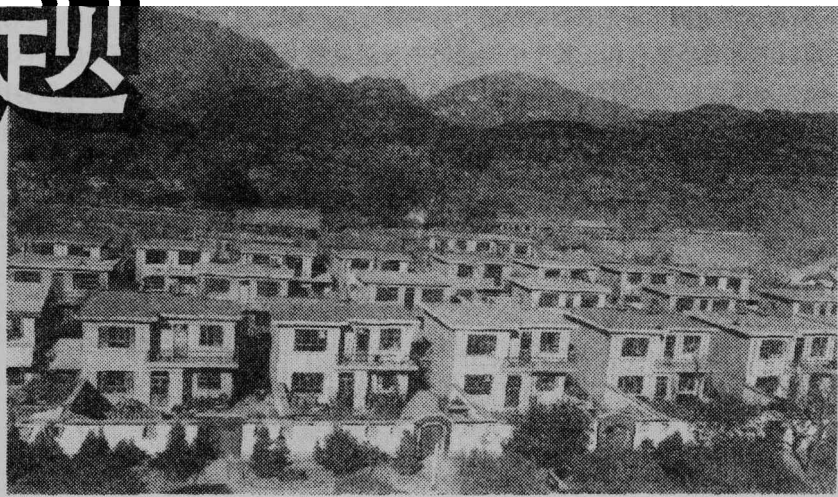
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得从认识中国农民起步。根据我们平时的调查研究，我把当代中国农民的特点初步理成8条：

第一，中国农民是我国最大的社会群体，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群体。全国4个人中有3个是农民，全世界4个农民中就有1个是中国农民。既然社会的发展是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那么占全国人口3/4的这一社会群体的权益得不到保障，生活得不到改善，政权是不可能巩固的，社会也无法取得进步。中国的农民问题解决好了，也是对世界的又一个重要贡献。

第二，中国农民跟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有着长期的良好关系。从我们党建立后搞农民运动，经过一次、二次国内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解放后40多年，中国农民一直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最可靠的同盟军，对革命和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自身也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同农民的关系有了进一步发展，农民是改革开放的率先受益者，衷心拥护党的改革开放政策。

第三，当前中国农民处于大分化、大变迁的过程中。国家处于大变迁中，变得最多的是农村。建国后40多年来，农村有3次大变化：一是土改，无地少地的农民变成了有地的农民；二是合作化、公社化，土地从农民个体所有变成合作所有、集体所有，个体农民变成集体化了的农民，变成了社员；三是改革开放中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由社员变成了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农民有了劳动选择权、经营权、土地使用权等，由此又产生了一系列变化，这些变化现在还在进行。特别是80年代乡镇企业的崛起，个体工商户的涌现，私营企业的萌生，以及90年代的“民工潮”和“造城运动”的兴起，使农民产生了大分化，主要靠种田吃饭的基本上清一色的农民队伍分成了8个阶层，有农

□ 陆学艺





业劳动者、农民工、雇佣工人、智力型职业者、个体工商户与个体劳动者、私营企业主、农村社会管理者、乡镇企业管理者。现在还在继续分化,继续变。

第四,中国农民正处在社会大流动中。各国经验表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都会引起社会人口大流动,农民在离开土地、离开农业的大流动中变成从事二、三产业的非农民,我国正处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只是由于现行的户籍制度,农民流动了,但身份还是农民。这些年来,包括进入乡镇企业的近2亿农民的社会大流动,加速了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速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第五,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生活差距在拉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农民的收入差距是很小的,现在差距大得很。可以说中国现在最穷的人是农民,最富的人也是农民。最富的有亿元户几亿元户乃至几十亿元户,最穷的还有约7000万人至今没有脱贫。总体看,种田的人之间差别不算大,差距大是农村里各种产业发展引起的。庞大的农村贫困阶层怎么办,日益成为中国的一大难题。

第六、农民的组织程度弱化。特别是有些地方的基层社区自治机构和集体组织呈现瘫痪半瘫痪状态,这些地方的农民如“一盘散沙”,呼唤着代表农民利益又适应市场经济的组织机制的诞生。

第七、农村还是以家庭为核心、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结构。这个格局是中国传统社会留下的,中国的家庭、家族、血缘观念也是世界上特有的。家庭既是生产单位,又是生活单位,还是教育单位。中国农村家庭的生命力特强,特别旺盛,和国外不一样。前阶段的改革成功,也靠这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充分发挥了中国农村家庭的作用,这对社会稳定发展也起了作用。

第八、中国农民的传统观念还比较强。对中国广大农村而言,不要过高估计这些年来农民观念的变化。遇到大事,许多农民还是按传统文化去办。传统文化的根在农村。当然,我们对传统文化要有正确认识,要用好的方面。

二、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方法

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我一向认为既要就事论事,一步一个脚印地实实在在干,又不能局限于就事论事,仅仅局限于农村范围内,在解决紧迫的现实问题上找不到解决农民问题的长远之策的。这就是要处理好治标与治本的关系问

题。

政界的同志偏重于“就事论事”,而研究界的同志偏重于寻求长远之策,各执一端,讲不到一起。其实从各自的职能看,两方面都没有什么不对,问题是要加强沟通,相互靠拢,当政者要多听研究者的意见,研究者要体谅当政者的苦衷,这样就能把两方面的意见有机结合起来,达到既治标又治本的目标。

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阶段,我们的社会正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我们的经济正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在我看来,这个社会转型时期农民问题的实质,就是要充分调动9亿多农民的积极性,组织好这支庞大的队伍,更好地投入现代化进程。在这个过程中,使大部分农民逐步离开农业、离开农村、进入工业、进入城镇,成为非农民。留在农村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也要改变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成为现代农业的生产经营者。这显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已有一些地方初步实现了这样的目标。他们提供的基本经验,就是把解决农民问题与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结合起来,在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中逐步解决农民问题,而不是把农民问题孤立起来,满足于就事论事的采取一些应急措施。我这几年来所提出的“反弹琵琶”的主张,也就是这个意思。

三、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模式

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不能靠一种办法、一个模式,中国农村的巨大差异性和多样性特征,规定了必须采取多种办法、多种模式。西方的经验可以吸收,但决不能照搬;马列的基本原则必须坚持,但并无我们需要的现成答案。可喜的是我国农民在党的改革开放方针指引下,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创造了行之有效的多种模式,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晋江模式、宝鸡模式、耿车模式等,各自在发展当地经济和社会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全国的相应地区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比较起来,我个人认为苏南模式较为符合中国国情,是解决中国农民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的一种办法。

苏南模式不仅能够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苏南地区17年来国民生产总值已经翻了三番还多,在全国是名列前茅的,而且有利于各种资源的合理使用和农村劳力的较快转移;有利于协调农工副三业关系;有(下转第14页)



台措施的效果,影响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当前,必须集中力量打好企业改革的攻坚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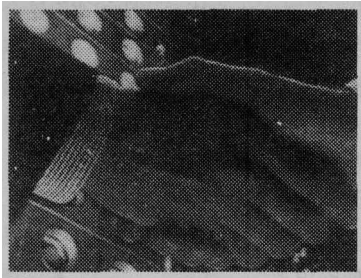
但是,企业改革不可能单项突进,孤军深入。企业改革越深化,就越要求抓紧进行宏观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和一系列单项改革,为企业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目前应突出抓好以下几方面的配套改革:

一是与企业产权改革密切相关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要以最大限度地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标准,按照“国家统一所有,政府分级监管,企业自主经营”,以及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分开,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与运营职能分开的原则,从制度层面上明确规范中央和地方在财产方面的责权利关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但不管具体形式如何,都必须防止国有资产直接的或变相的流失。

二是以养老、失业、医疗保险制度为重点,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切实保护职工的基本利益。关于资金来源,可以实行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负担的原则。考虑到国有企业的发展历史和眼前财力有限,可以将一定比例国有资产产权或其转让收益作为社会保障基金,交由专门的社会保障机构管理、使用。这既有利于解决企业富余人员多、负担重的困难,一定程度上还可推动公有产权主体的多元化。

三是培育和规范要素市场。通过建立发达、完善的劳动人才市场、资本市场、土地市场,促进各类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择优重组。这是推动企业改革、改组的基础性工作。

四是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可以结合解决企业债务重和清理银行不良资产,将一部分原拨改贷资金转为国家投资,补充企业资本金;同时探索债权转股权,理顺银行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加快国家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的转变,强化银行对企业的监督、调节职能。



此外,政企分开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又是深化企业改革的前提,必须围绕转变政府职能这个关键,下决心推进政府机

构改革,建立起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继续进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通过建立健全人才市场和一整套科学的用人机制,一方面形成一批高水平、职业化的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另一方面也培养造就一支熟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知识、善于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管理宏观经济的公务员队伍。

企业改革与各项配套改革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处理好两者关系应以企业改革为中心,统一目标,统一规划,统一部署。

典型的现代企业制度是公司法人制度。在企业内部,只有构建起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的关系,并正确处理三者之间的关系,包括形成合理的责权利体制和法人治理结构,才能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因此,正确构建和处理企业内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的关系,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处于核心的地位。只有正确处理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才能实现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的分开,以及对国有资产的行政管理监督职能与经营职能的分开,才能塑造出千万个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独立的利益主体和决策中心,才能使所有者人格化的代表进入企业内部,从而才能构建起企业内部三者之间的关系。因此,正确处理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前提和关键。文中涉及的其他三个重要关系,实际上是企业改革与改组、改造、管理和配套改革的关系,它们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要的环境、条件和保证。总之,只有正确认识和处理好这五个重要关系和其他关系,才能顺利地建立起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

面向二十一世纪,对于国有企业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要认清对企业改革发展至关重要的三个转折: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短缺经济转向供需大致平衡,高关税保护正在转向世界经济一体化。因此,我们应当牢牢抓住两个根本性转变,以提高效益为中心,在建设好班子、形成好机制、完善内部管理上下功夫,争取在本世纪末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使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再遭辉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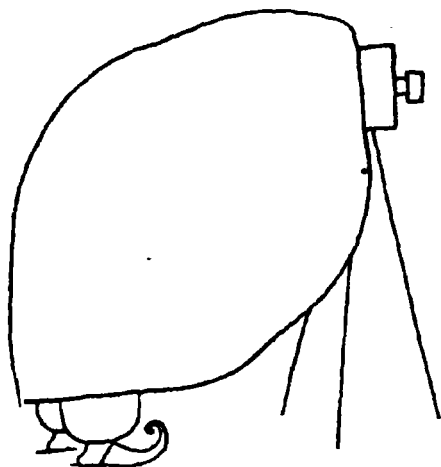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
责任编辑:侯玉林)

(上接第9页)利于协调社区内部关系,达到共同富裕目标;有利于向现代企业转化;有利于推进小城镇建设,促进城乡一体化目标的实现;有利于社会事业发展;有利于两个文明一起抓;有利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社会风气比较好,社会也比较安全。这几年,为了研究农村问题,我差不多每年都到苏南作一点调查。有位领导同志跟我讲,我们这里发展乡镇工业,坚持三条原则:一不牺牲农业,二不牺牲环境,三不牺牲社会风气。看了这里的农业,确实并不是口号农业、口头农业、口粮农业、不是三口百(个)会农业,即所谓的“山口百惠”农业,一些典型单位的农业设施比欧洲的标准还高。看了苏南,看到了我国农村现代化的未来,更增强了解决我国农民

问题的信心。
但是,苏南模式要进行再认识,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取得新发展。我个人认为,评价苏南模式,在推进社会全面进步中的作用总结还不够,特别是在教育农民、改造农民,使传统农民转变为非农民、变为现代农民方面的作用研究总结不够,这是对苏南模式进行再认识的一个新课题。

“70年代造田,80年代造厂,90年代造城”,看来是到了加快农民进城,加快城市化步伐,加快农村现代化的时候了。在苏南等发达地区则更应在这几个方面走在前头。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研究员
责任编辑:阎文学)



○“九七”香港回归距今不到四百天了，随着这个历史时刻的到来，人们普遍关切的问题是，香港将面临着什么样的前途和命运？现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经济小组召集人、著名经济学家高尚全先生的文章：**“九七”后香港经济的展望**，对香港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和繁荣抱乐观态度。

○中国4个人中有3个是农民，全世界4个农民中就有1个是中国农民，因此农民问题一直是我国政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著名农村农民问题专家、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陆学艺先生的文章：**农民问题：中国的一大难题**，提出了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精辟见解。

○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过程中，应如何处理企业与政府、企业内部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企业改革与管理、企业改革与配套改革、改革改组改造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深化企业改革中无法回避的重大关系问题，对此，中宣部理论局董京泉、王子军先生的力作：**关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的几个关系问题**，作了较系统的分析，很值得一读。

○中国对资金的饥渴，恐怕是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个经济飞速发展的国家都难以比拟的。经济的飞速发展和资金短缺的矛盾，就迫使众多企业千方百计地寻找新的解渴途径。中华工商时报记者胡舒立、墨宁的文章：**小胡同通向大马路**，将给企业家们以新的启示。

○对于大多数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的中国学者来说，特里尔近乎一个圣地，因为她是卡尔·马克思的故乡。俞可平先生应邀在特里尔大学作短期访问讲学期间，亲眼看到一些学生要求将特里尔大学改名为卡尔·马克思大学的热烈场面。马克思属于德国，也属于全人类。若想了解马克思及其思想今日在西方世界的影响，不妨读一下俞可平先生的文章：**追寻卡尔**。

本期导读